



□马丽董川

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进程近30年来，双方关系进入全方位发展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东盟合作抗疫生动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诠释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邻里之道，展现了双方命运与共、共克时艰的意志和决心，为双方深化互信与合作，迈向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带来新契机。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由愿景向现实迈进

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东盟对话伙伴中，中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明确支持《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第一个确定同东盟建立自贸区，第一个与东盟制定双方中长期愿景规划。双方建立了包括领导人会议、外长会、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在内的对话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对话伙伴中最具活力、最富内涵的一组关系。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首次提出同东盟国家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还首次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8年11月，为纪念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规划双方关系未来发展方向。2019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发表《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整体发展规划对接，明确了双方合作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举措，推动双方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迈出重要步伐，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优势互补和联动发展，为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建设注入新动力。

2019年4月，中国同柬埔寨、老挝先后签署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

划。2020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缅甸，中缅双方就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缅甸成为东盟国家中第三个同意与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盟成员国在双边层面就构建命运共同体签署行动计划和达成共识，有助于从整体上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由愿景向现实迈进。

合作抗疫充实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内涵

中国与东盟走在合作抗疫的前列，双方在全球疫情爆发之初即举行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举行中国—东盟卫生专家视频会议。中方铭记东盟国家对中方抗击疫情的支持和帮助，对疫情在东盟国家扩散蔓延感同身受。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先后同印尼、老挝、越南等国领导人通电话，向东盟国家抗击疫情表达诚挚慰问和坚定支持。中方向东盟国家陆续提供了抗疫物资，派出医疗专家组，并协助从中国采购抗疫物资。双方再次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视频会议，分享疫情防控和治疗经验，并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强化东亚地区国家合作意识，提振合作信心，明确合作方向。

中国与东盟合作抗疫生动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与东盟国家毗邻而居，往来密切，疫情监测与防控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愈加突出。无论是在疫情爆发之初还是疫情蔓延之后，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与东盟国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交流疫情防控和治疗经验。双方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举办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中国—东盟卫生专家视频会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视频会议是双方合作抗疫的真实写照和务实举措，是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彰显了双方合作抗疫的坚定决心、情同手足的友谊和务实高效的行动，为全球合作抗疫树立了典范。

中国与东盟合作抗疫诠释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邻里之道。在中国

抗击疫情最困难的时刻，东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或外长以致信、通话和到访中国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以及与中国共克时艰的信心和决心。东盟发表《关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东盟主席声明》，对中方抗击疫情的努力表示支持。东盟各界人士通过捐款捐物、祈福和录制祝福视频等为中国人民加油鼓劲。随着疫情在东盟国家的蔓延，中国政府通过捐助医疗物资和派遣医疗专家组向菲律宾、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老挝等东盟国家及东盟秘书处提供帮助。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民间友好人士和机构也向东盟国家伸出援手，捐助了大量医疗物资和设备。

中国与东盟合作抗疫为双方化危为机、深化合作注入新动力。双方2002年发表《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此后就防治“非典”、禽流感等传染病开展了合作。此次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双方在公共卫生领域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就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具有跨境威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深化双边合作、推动区域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双方将努力化危为机，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通过加强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合作，帮助受到疫情冲击的中小微企业利用数字经济重新焕发生机。通过加强智慧城市合作，打造智能化、集约化、人性化的“城市大脑”，提高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反应和处理能力。

中国—东盟携手迈向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在政治安全层面，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全方位发展新阶段。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和各层级对话合作机制推动下，双方保持密切交往与沟通。中国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发挥更大作用，赢得东盟的信任与合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南海形势总体趋稳向好。双方在东盟防长

扩大会（ADMM+）机制下深化防务合作，共同应对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跨境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已成功举行两次海上联合演习。双方在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中保持良好沟通与合作。

在经济贸易层面，中国与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对区域合作的理念相似，都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中国连续10年保持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第一季度，东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方面有更多合作空间。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建成10年，自贸区升级议定书的全面生效加速双方经济融合发展，有助于东盟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终达成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方兴未艾。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启动近4年来，机制建设日益完善，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从快速拓展期进入全面发展期。

在社会人文层面，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亮点纷呈。人文交流已成为双方关系中与政治安全、经贸合作并列的第三大支柱。中国同东盟国家已结成201对友好城市。东盟在华留学生接近10万人。中国与东盟互为主要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地，每年人员往来超过6500万人次。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成为双方人文交流的旗舰项目，搭建了青年一代相互理解与友谊的桥梁。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青年、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日益深入，通过举办旅游合作年、创新年、媒体交流年，双方在文化交流、创意文化产业、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并取得重要进展，双方民众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不断加深。



维也纳体系是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被公认的第二个国际体系，其最主要贡献是形成了大国协调机制，之后欧洲出现了较长时间的总体和平局面。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从此，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而不再是宗教信仰。战争依然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家常便饭，只不过是战争的目的改变了而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多极格局，不过，伴随着大国兴衰，欧洲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不断变换，到18世纪末时，英法俄奥普成了主角。

爆发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拿破仑战争打破了多极均势状态并终结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此同时，思想观念之争再一次成了左右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本是法国内部事务，但却遭到欧洲封建君主国的联合围攻。欧洲各封建君主国加上保守主义影响下的资本主义英国组成了7次反法联盟，同法国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战争。除了奥斯曼帝国外，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这场大战。军事强人拿破仑统治法国后，在反击反法联盟进攻的同时，通过武力横扫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将资本主义理念和制度向欧洲各国推广。与此同时，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建立和扩张，许多国家的领土主权被拿破仑帝国剥夺。最后，法国终因国力不支，一国难敌数国，拿破仑战败，帝国也随之灭亡，复辟的波旁王朝被迫接受和谈。

和会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史称维也纳会议。和会通过的最主要文件是《最后议定书》，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在法国以及被拿破仑占领过的国家恢复旧王朝的统治；二是恢复拿破仑战争之前的欧洲国家领土状况。欧洲在封建主义复辟的基础上恢复了秩序。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形成。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说，维也纳体系是“反动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都被这个体系破坏，“旧秩序”得以恢复。特别是在这个体系基础上形成的由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国君主发起，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的“神圣同盟”成了维持封建专制制度的坚强堡垒。当然，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在一波又一波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特别是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的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封建专制制度在欧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神圣同盟”也名存实亡。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维也纳体系却是有重要贡献的，这就是开创了大国协调机制，也称欧洲协调机制。主导维也纳和会的四个大国——英、俄、奥、普——在维也纳会议结束数月后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核心内容是：为了维持欧洲和平（当然也是为了本国的安定和繁荣），缔约国要定期召开会议。该条约有效期为20年。四国同盟起初主要是针对法国，防止法国再起。后来随着法国同各国关系的改善，法国也加入进来，四国同盟

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的案例

□刘建飞

变成了五国同盟。于是，欧洲五个大国便定期举行会议，协商欧洲事务。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看，这个机制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以至于西方学者称此后100年的欧洲国际关系为“黄金时期”，类似于三十年战争或拿破仑战争那样的大战没有出现。不过，这个欧洲协调机制毕竟是大国竞争的产物，随着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大国协调机制逐渐失效。伴随着克里米亚战争、德国统一战争和普法战争等局部战争，五国联盟不复存在。特别是德国统一后强势崛起，欧洲的多极格局逐渐解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式宣告维也纳体系终结。

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协调机制为国际关系演进和国际秩序构建提供了新内容，后来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借鉴了这一点。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大国协调并非欧洲的独创。中国早在周代就出现了“春秋五霸”定期举行“会盟”。只是秦统一中国后，华夏大地上的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一统成了追求的目标，如此，“大国协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欧洲则在“主权原则”指导下，形成了众多的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因此需要大国协调来维护欧洲国际秩序。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与应对

□陈静慧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多点暴发、急速蔓延，严重危害了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冲击了全球产业链有效运转。我国既面临全球产业链重塑的挑战，也迎来产业链再造的新机遇，需要主动谋划，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巩固本国产业链内生优势，维护产业链竞争力，团结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性。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

疫情暴发前，全球化使产业链紧密联系、相互依存。据统计，截至2018年，全球中间产品出口贸易量达9.7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出口贸易额的52%。为遏制疫情蔓延，全球多数经济体普遍采取史无前例的防控措施，世界范围内的人员、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受到限制，部分国家生产停滞，加之原油市场大幅波动、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等负面因素叠加影响，使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加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疫情重创世界各国实体经济。部分产业链停摆导致大量失业，收入减少引发需求萎缩，产业链危机由供给端扩散至需求端。供需两端同时萎缩进一步加剧对产业链的冲击，全球经济可能陷入长期衰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月初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从疫情暴发前的2.9%下调至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0%，成

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世界贸易组织4月8日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32%。

二是疫情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倾向。有的国家采取内顾政策，收回产业链甚至设置贸易及技术壁垒，推动全球产业链本地化、分散化趋势，导致部分产业链收缩，全球产业链不稳定性升级。

三是疫情强化了产业链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一季度，我国和东盟贸易额逆势增长，达到9913.4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61%。其中，我国对东盟出口5394.3亿元，增长2.4%；自东盟进口4519.1亿元，增长10.9%。东盟超过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我国与东盟集成电路进出口大幅增长，拉动我国与东盟外贸整体增长3.3个百分点。其中，我国自东盟进口集成电路1056.5亿元，增长25.8%，占自东盟进口额的23.4%；对东盟出口集成电路427.5亿元，增长28%，占对东盟出口额的7.9%。

疫情对我国产业链的冲击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凭借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体系，与世界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和

相互依赖关系。根据世界发展指数（WDI），截至2018年我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资企业创造了约1/4的全球工业增加值，机械与运输设备及杂项制品作为我国主要出口产品占全球出口贸易额的19.2%。相关研究显示，201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0%以上。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之中大部分处于“夹心层”位置，海外上下游企业停工停产，导致国内企业复工复产难。疫情影响下，短期修复产业链、中期避免产业链外移、长期加速产业链升级需求更为紧迫。

短期内，由于存在一定的中间品备货，供应链受冲击程度尚未完全显现，疫情对我国产业链冲击总体可控。海关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4月份我国外贸出口2002.8亿美元，同比增长3.5%，增幅较3月份扩大10.1个百分点，贸易形势明显改善。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十大类贸易品进出口数据分析，我国受全球需求萎缩冲击较大的行业分别是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家具行业、电气设备、机械及运输设备、纺织服装等行业。4月，我国纺织品出口在防疫用品的带动下迅速反弹回升，出口额1027.9亿元，增长56.2%，拉动整体出口实现增长。

长期看，如果海外疫情持续得不到改善，海外供应链中断对我国供应链冲击效应将逐渐显现。以我国为中心的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不确定性增大，一些国家及跨国公司急于寻找产业链替代方案，以分散及规避投资风险。

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的具体应对措施

一是保证我国产业链平稳运行。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促进作用，保证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打通产业链发展“堵点”，补上“断点”。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聚焦重点地区重点行业产业链，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发展，解决上下游、大中小配套企业复工复产进度不平衡等问题，恢复产业链复工复产达产循环畅通。扩大国内消费和有效投资，协同推进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循环，创造复工复产的市场需求。形成部门合力，建立综合协调工作机制，强化信息平台建设，密切工作联动，为供应链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提升我国产业链国际竞争力。实施产业链提升工程，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优化产业链格局。聚焦产业链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将数字技术贯穿全球产业链发展各环节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引领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加快国内产业集群建设，强化产业链在优势区域的集聚化程度，将我国产业链优势长期稳定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提升产业链的协同力、创新力、附加值和安全性。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优势，支持领先企业开展产业链体系建设，增强对全球产业链的引领力。

三是确保我国产业链联合自主可控。做好产业链安全防范的顶层设计，在制度、组织、机制层面做好总体布局。增强产业链韧性，提高高技术产业链应对外部“断供”的能力，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链自主性，保证产业链所需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不受制于人，筑牢我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根基。构建全球产业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做好精准防控，聚焦关键行业、重点行业、涉及民生行业的安全发展。完善突发事件应急产业链服务体系，健全应急产业链产能弹性机制。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国际合作与治理。加强国际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全球产业链安全治理，建立全球产业链应急协同机制，探索危机治理机制、决策体系、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推动全球产业链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发展。维护包括医疗物资在内的重点产业链的安全，保障重要抗疫物资和生活物资的生产和出口。积极推动产业国际合作，推动建立疫情防控条件下的产业链协调合作框架，加强产能供需信息沟通。坚定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确保物资和服务自由流动，保证全球关键物资跨境流动，重振国际经贸发展信心。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推动外资项目复工复产，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引资补链、引资扩链，积极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增长点，推进专业化分工、多元化合作，实现国际资本在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共享。